

# 公共生活与 公民教育：

学校公民教育的哲学探究

刘铁芳 著

NGGONG SHENGHUO YU GONGMIN JIAOYU:  
xiao Gongmin Jiaoyu de Zhexue Tanjiu

013068198

G417  
02

# 公共生活与 公民教育：

学校公民教育的哲学探究

| 刘铁芳 著



北航

C1676164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G417

02

出版人 所广一  
责任编辑 何 艺  
版式设计 杨玲玲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曲凤玲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公共生活与公民教育：学校公民教育的哲学探究 /  
刘铁芳著.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 7  
ISBN 978 - 7 - 5041 - 7657 - 8

I. ①公… II. ①刘… III. ①学校教育—公民教育—  
研究 IV. ①G4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6454 号

### 公共生活与公民教育：学校公民教育的哲学探究

GONGGONG SHENGHUO YU GONGMIN JIAOYU; XUOXIAO GONGMIN JIAOYU DE ZHEXUE TANJIU

---

|      |                    |       |                                                             |
|------|--------------------|-------|-------------------------------------------------------------|
| 出版发行 | 教育科学出版社            |       |                                                             |
| 社 址  |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 市场部电话 | 010 - 64989009                                              |
| 邮 编  | 100101             | 编辑部电话 | 010 - 64981167                                              |
| 传 真  | 010 - 64891796     | 网 址   | <a href="http://www.esph.com.cn">http://www.esph.com.cn</a> |
| 经 销  | 各地新华书店             |       |                                                             |
| 制 作  | 北京金奥都图文制作中心        |       |                                                             |
| 印 刷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版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
| 开 本  | 169 毫米×239 毫米 16 开 | 印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张  | 14.25              | 印 数   | 1 - 3 000 册                                                 |
| 字 数  | 187 千              | 定 价   | 32.00 元                                                     |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015100

本书为教育部2012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NCET-12-0719)、国家社科基金2010年度教育学一般课  
题“公共生活的拓展与学校公民教育的重建研究”(课题  
批准号:BFA100043)、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  
题“学校公民教育的哲学基础与实践模式研究”(课题批  
准号:XJK012ADY002)研究成果。

# 目 录

## 引 言 | 精致的利己主义症候及其超越:

当代教育向着公共生活的复归 | 1

## 第一章 | 公共生活与公民教育:

学校公民教育的内涵与目标 | 24

## 第二章 | 公共生活的开启与学校教育目标的提升:

学校公共生活的特殊性及其内在结构 | 47

## 第三章 | 学校公共生活的扩展与学生公民人格的形成:

以公共理性与公民责任为中心 | 69

| 第四章 | 学生何以进入公共生活之中：

基于学生视角的学校公共生活建构 | 91

| 第五章 | 话语的扩展与学校公共生活的开启：

基于学校视角的学校公共生活建构（一） | 115

| 第六章 | 活动作为公共生活的基本形式：

基于学校视角的学校公共生活建构（二） | 141

| 第七章 | 学校公共生活中的教师：

教师作为公民实践的范围 | 167

| 第八章 | 学校公共生活中的规训与自由：

学校公民教育的限度与教育的审慎之道 | 190

参考文献 | 214

后 记 | 222

## | 引 言 |

# 精致的利己主义症候及其超越： 当代教育向着公共生活的复归

教育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需要人们持久关注的根本性问题。应该说，我们今日的学校教育正在大步向前迈进，基本办学条件的改善自不待言，教师的基本素养和职业热情也逐步攀升，学生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稳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与个性发展的水平整体上也呈上升趋势。问题在于，我们的学校教育整体上依然未能摆脱应试主义的窠臼，学生在学校教育中的陶冶空间日渐缩小，他们在获得应试阶梯上的晋升的同时，并没有获得个体人生气象的同步扩展，从而导致了精致利己主义症候的产生，这使得当前教育实践中依然弥漫着浓郁的功利主义倾向。以公共生活来开启学校教育空间，意在凸显教育的本质乃是个体成人，成为服务社会的公民。学校并不只是个体升学的扶手，而是个体灵魂上升的阶梯；不是实现个人私己性欲望的工具性场域，而是促进人的公民性生长，发育完整而健全之人性的教化性场域。怎样切实地开启学校公共生活视野，拓展学校教育的精神空间，提升学校教育的价值目标，当是今日教育发展的要义所在。

## 应试教育与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形成

亚马逊 CEO 贝索斯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讲演中提到他和祖母之间的一个故事。

我听过一个有关吸烟的广告。我记不得细节了，但是广告大意是说，每吸一口香烟会减少几分钟的寿命，大概是两分钟。无论如何，我决定为祖母做个算术。我估测了祖母每天要吸几支香烟，每支香烟要吸几口等等，然后心满意足地得出了一个合理的数字。接着，我捅了捅坐在前面的祖母的头，又拍了拍她的肩膀，然后骄傲地宣称，“每天吸两分钟的烟，你就少活九年！”我清晰地记得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而那是我意料之外的。……我们在房车旁停下来。祖父注视着我，沉默片刻，然后轻轻地、平静地说：“杰夫，有一天你会明白，善良比聪明更难。”（贝索斯，2012）<sup>22</sup>

“天赋和选择不同。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天赋之聪明更多地涉及人的思维的灵活性，善良的选择则直接关涉人的生活方式；聪明指涉个人才智的运用，善良则需要对个人才智运用做出合理的判断，涉及人与人、人与事物的复杂关系。一个人天赋之聪明的过于显露，会妨碍个体对事物之复杂性以及个人与事物之关系的关注。这意味着个人的天赋在使用过程中需要必要的节制，避免判断的简单化。个人的聪明才智只有置于生活世界之中才是有意义的。仅仅让个人的才智得到发展是远远不够的，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不过是聪明的动物，个体要完整成人还必须将自己置于人与人的关涉之中，置于公共交往之中，置于国家社会之中。

有人曾做过调查，将中外父母的问话进行了对比。在中国，父母把孩子从幼儿园接回家时说的第一句话通常是：（1）今天在幼儿园吃什么了？（2）你今天学什么了？（3）有人欺负你吗？（4）今天老师布置作业了吗？而国外父母问孩子的第一句话通常是：（1）你今天快乐吗？（2）今天有什么有趣的事吗？（3）你有什么作品吗？（4）今天和大家玩得高兴吗？不同的问话体现了不同的教育理念和方式。中国的父母比较关注孩子的生活情况和学习情况，而国外的父母则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孩子的情绪、情感、兴趣、能力以及孩子自身成功感的建立和与伙伴的交往上；中国的父母更集中于孩子自身，国外的父母更多地关注置身群体之中的孩子的情状。前者的关心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可能会让孩子自己对生活和学习过程有更多的关注，而忽视了情绪情感的变化、成功感的建立等。而后者的问话更容易让孩子有倾谈的欲望，有表达的意愿，会让孩子对自己的作为有所感触，并且会对明天的幼儿园生活产生向往。

撇开这个对比的真确与否不谈，我们单来看两者——哪怕是虚拟的——对比中所隐含的教育问题。前一种问话更多地呈现出一种以自我为焦点的教育取向，也就是让孩子在学校生活中更多地活在自我关注之中，而不是充分地进入学校公共生活之中；而后一种问话更多地引导孩子如何去认识、参与、分享公共生活并在其中显现自我，让个体积极地活在学校公共生活之中，保持个体向周遭世界的开放性。如果说两种教育取向都可以培养人的聪明才干、知识技能，那么它们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前者会促使个体在自我成功的追求中走向自我封闭，而后者会引导个体积极融入他人和世界，培养开放的个人。实际上，在我们的教育现实中，大抵是第一种倾向居多，甚至可以说，我们今天的教育正在越来越多地走向“精致的利己主义”。

↑ 幼儿阶段的教育踪迹，恰恰是整体教育取向的写照。近日，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

会”上语惊四座：“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钱理群，2012）<sup>3</sup>“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关键词，一是精致，二是利己主义者。所谓精致，即是素养很高，或者基本素质很高，时尚而新潮；所谓利己主义者，则意味着他们的思考与生活所及的范围更多的是个人利益。换言之，他们的高素质所指向的不过是个人的—己发展，而非把个体成长始终置于时代与社会的内在需要之中。钱理群先生在这里所揭示的与其说是北京大学的问题，不如说是当下中国教育的整体症候。从小在应试教育的圈隅之中，个人所眺望的不过是在学业的阶梯上通往更高更好学校的门扉，而不是如何把自我置于与周遭他人的关系之中，置于时代与社会的大背景之中，获得个体人格的充分发育。大学越来越多地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不过是在整体教育成品上的集中体现而已。

应试教育究其实质而言乃是一种训练的教育。训练的教育因为没有充分敞开个体人格的世界，而导致个体人格发育的窄化。这样的结果就是，学生自童年起就活得很累，很沉重，心灵生活疲惫，生命过早地枯竭，这意味着个体精神生活的无力。可以说，当今教育制造出了大批的“奴性个体”，学生们沦为精致的劳动者，没有开启个体生命之中的自由生活习性。

### 平庸的恶与公共精神的遮蔽

20世纪60年代，阿伦特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组题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篇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的系列文章，她提出了一个非常富有启示性的观点，即像艾希曼这种组织实施大屠杀的纳粹军官，

具有的只是“平庸的恶”，比如顺从和不负责任。艾希曼是犹太文学、美术的爱好者，熟悉犹太经典，从1937年起，一直被认为是犹太人问题“专家”。这个双手沾满了犹太人鲜血的“杀人魔王”，其本人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反犹主义者”，尽管他在1932年就加入了党卫军。在法庭上他诉说不是自己决定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而是“被吸收”进去的，他甚至连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都没有读过。他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很少和别人谈论流行话题，包括种族歧视的话题，严谨、勤奋、努力的品格帮助他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的特点是精明强干，从不失手。为了完成一个目标，他会以最大意志、尽最大努力排除一切困难。从1938年到1941年，他负责驱逐在德国的犹太人。1941年到1945年，他负责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以及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吉普赛人去死亡集中营。1944年3月在德国已经溃败的情况下，艾希曼到了布达佩斯，组织向奥斯威辛的运送。1944年3月15日起，他和他的部下经常每天把1万人送到指定地点。此后4个月中，他组织运送了70多万犹太人。到了战争快结束的时候，火车车皮不够用了，艾希曼便让被捕者自己步行走向死亡营。此时匈牙利的犹太人组织已经多次和纳粹当局秘密交易，讨价还价，用金钱和财产换取犹太人的性命，但是艾希曼从来不参与这样的交易。他认为那样做“违背自己的良心”，也就是说，他的“良心”要求他每天将成千上万的人类成员送到指定的死亡之地。

据说，艾希曼也曾经有过不适应。一次，他的上级要求他提供死亡报告，他因为不愿意去现场目睹惨不忍睹的场景而提出辞职报告（在审判法庭上他说自己会“恶心”）。他的上司缪勒答复他：“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因此，他仍然坚守岗位。实际上他的工作也主要是在办公室进行，他直接打交道的是各种文件、电报、电话以及红色铅笔，他每天埋头于时刻表、报表、车皮和人头的统计数字。他具体的工作目标是效率和提高效率，衡量他工作成败与否的直接标准是他的“运输”能力，他听不见遇害者惨烈的叫喊（像“毒气浴室”的发明，也是为了让

任何人都听不见)。借助于先进的现代技术，在纳粹德国统治下，杀人变成了一条工业流水线，被分解成若干个互相分离的单元，在这个流水线上“工作”的人们只是各司其职，做好本职工作，不去过问下一个环节将要发生什么，他们所要完成的像是一个庞大的技术工程。难怪艾希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只，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阿伦特以艾希曼的行为方式来阐释现代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的恶”，这种恶是他不思索，不思索人际，不思索社会。恶是平庸的，因为你我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这种恶绝不仅仅发生在纳粹集中营，发生在畸形的年代，比如“文革”中大量出现的各种“不得已”的告密、检举、揭发等，它同样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我们身边，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随手可及的恶。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或者成为不道德体制的真实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者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这就是现代社会技术化、体制化之中个人平庸的恶的基本表现。

我曾听闻这样一件事：学校图书馆有一位老师，患有较严重的抑郁症。他去医院看病时，询问医生有关病情的治疗状况。医生说，这个病治不好。这位老师回去后不久就从图书馆四楼跳下去，自杀身亡。对于那位医生而言，断言抑郁症治不好，也许是一个医学专业的一般性病理诊断，却并不是从患者的生命状态及其可能性出发，其漫不经心的态度可能葬送患者活下去的勇气与信心。2010年10月9日，山东省临沂市第六中学13岁的初一女生张悦因不符合学校短发令要求，三次被赶出校门后在家喝下农药自杀。（曹建民，李君，2012）<sup>14</sup>2012年4月13日晚19点30分左右，山东省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八年级（1）班14岁的

女生李欣玥从自家五楼的窗户跳下，14日早晨，因抢救无效身亡。（谢东樱，2012）学校中，教师以执行学校规章制度的名义，三番五次斥责学生甚至导致学生自杀的事件屡有发生。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能会以学校规章制度的名义来为自己推脱责任，看不到或不愿看到教师自身与学生生命之间真实的道德责任。公共生活中，医生随意的诊断，教师随意的批评、惩罚<sup>①</sup>，都是人性的麻木与平庸之恶的显现方式，工作中的一言一行不过是照章办事，没有带着自己的思考与判断进入当下的职业生活之中。这种人性状态，既是学校教育中孕育的狭隘利己主义者的人格示范，同时又成为年轻人走向社会后的平庸化人格诉求的依据。

香港中文大学学者周保松做出了这样的反思：“几十年在这小岛上，安顿无忧，成家立业，手中物一天一天多起来，名和利一年复一年把人缠得紧。我们拥抱着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们的情只为个人牵系，我们的泪只为个人得失而流。过于珍惜自己，人自然变得老谋深算，再没有青春气息。这样，如何能挑动千斤担？如何结得成对向前行？”（周保松，2011）<sup>111</sup>这里的描述具有普遍性，社会竞争和生存压力加大，每个人都变得自顾无暇，这种精神生态向着学校教育延伸，从大学向中学、小学延伸，直接导致学校公共生活空间的锁闭和公共价值的衰微。

公共价值的衰微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对于我们尤为突出，因为我们毕竟没有形成过充分传扬公共价值的学校教育传统。当师生都沉迷在精致的应试教育体系之中，除了充分地应试，每个人不再拥有更多的思考

---

① 2011年11月18日，洛阳市实验中学初一（11）班13岁女生玲玲，因作业没完成遭到老师体罚——罚做“蹲起”800个，在完成动作的过程中，玲玲因体力不支摔倒，并遭到老师的打骂。由于不堪忍受身体和心理的压力，18日下午，玲玲从小区楼顶平台上跳楼自杀身亡。（韩聪聪，2011）在这个案例中，教师自身教育意识、规则意识的匮乏，导致教师批评、惩罚学生过程中的随意性，最终导致恶性后果的产生。教师只有在教育过程中坚持理性的清明，而不是个人情绪化的发泄，才能引导学生理性的健康发展，同时促进公共生活秩序的内在生长。

与判断时，教育也就自然地沦为了机械化生产车间的工作流程。“一张说着话的嘴和许多只耳朵，加上一半数量的写着字的手——这就是大学机构的外观，这就是事实上安装的大学教育机器。此外，这张嘴的主人与那许多只耳朵的拥有者们是彼此分离、互不依赖的，这种双重的独立性被人们兴奋地评价为‘大学的自由’。”（尼采，2012）<sup>90</sup>尼采对当年德国大学的批评同样切合于我们今天的教育现状，教育越来越多地被弱化为身体智能的训练，而不是置身公共场域中的现实个体之生命境界的提升。

### 素质教育：向着公共价值的提升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素质教育一直是中国教育的主导性诉求，尽管这种诉求并没有全然成为教育实践的内在精神，但教育要指向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已是普遍认同的主题。无疑，教育不能指向单纯的应试，而应指向个体本身，指向人自身的素质发展，这体现了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我们应该看到，是不是指向个体素质发展的教育就一定是好的教育？或者说，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素质教育？如果我们的素质教育指向的是个体素质的静态的组合，而不是把个体的素质发展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激活个体素质发展与公共生活的关系，那么这样的全面素质教育也不过是停留在私己性个人诉求之中的素质教育，换言之，这样的教育培育出来的很可能是高素质的利己主义者，也就是钱理群先生所言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精致”意味着素质的多方面的发展，“利己主义”则意味着这种多方面发展的素质指向的不过是个人趣味的满足，而不是置身公共生活之中的、为公共价值所引导的健全人性的扩展。

阿尔贝特·施韦泽<sup>①</sup>为我们重新思考素质教育发展的方向提供了堪称范式的启迪。施韦泽无疑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施韦泽，2006）<sup>5</sup>：他在音乐方面，很早就学会了即兴演奏，逐步成长为管风琴演奏家和巴赫研究专家；从施韦泽的学术才能来看，他不仅具有广博的人文学科知识，还是一个医学博士，堪称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典范；除了艺术才能和学术才能的协调，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结合之外，施韦泽全面发展人格的又一个特点是精神活动和实际行动的统一，他是用行动而不是用言论直接为人类服务。但他首先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施韦泽，2006）<sup>2</sup>。青少年时代，施韦泽的爱心首先表现在“为在世界上所看到的痛苦而难过”上。各种动物遭受的折磨使他难受，不为动物祈祷，使他迷惑不解。他从30岁开始学医，然后到非洲为黑人义务救死扶伤。在漫长的、极为艰辛的行医过程中，施韦泽的爱心从一种自童年起就具有的伦理情感，发展成为一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坚韧不拔的道德行为，他自己则成为20世纪西方行动人道主义的象征。

从静态的层面来看，施韦泽无疑是德智体美诸种素质全面发展的典型。但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全面发展素质中始终贯穿着“对人类苦难的无比同情和极其热忱的献身精神”（施韦泽，2003）<sup>150</sup>。正是这种对人道的普遍关怀，对公共价值的追求，使得他的全面发展素质不是供自我赏

① 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又译为史怀泽），德国哲学家、神学家、医生、管风琴演奏家、社会活动家、人道主义者，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1875年，施韦泽诞生于德、法边界阿尔萨斯省的小城凯泽尔贝格。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他精德语、法两种语言，他先后获得哲学、神学和医学三个博士学位，还是著名的管风琴演奏家和巴赫音乐研究专家。1904年，在哲学、神学和音乐方面已经拥有巨大声望的他听到刚果缺少医生的消息，决定到非洲行医。历经9年的学习，他在38岁的时候获得了行医证和医学博士学位。施韦泽于1913年来到非洲，在加蓬的兰巴雷内建立了丛林诊所，服务非洲直至去世。他获得了195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被称为“非洲之子”。爱因斯坦曾十分感慨地说：“像施韦泽这样集善和美的渴望于一身的人，我几乎还没有发现过。”

玩的纯然审美素质，而是向着人类的、饱含行动旨趣的、具备人类视野的、有着生动灵魂的实践素质。施韦泽的全面发展，“不是一种狭义的‘个人’‘能力’上的全面发展，而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通过与人们的共同合作，在奉献中的全面发展”（施韦泽，2006）<sup>8</sup>。施韦泽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所谓的素质发展从来就是立足公共生活需要的素质发展，唯有人人的素质发展与时代、社会以至人类的需要紧密结合，一个人的人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展现和成全。

诚如鲁迅所言：“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人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鲁迅，1998）<sup>103</sup>我们在走出泛政治化的社会模式、走向市场经济之时，由于缺少足够的文化启蒙，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如果说我们以前的教育目标是更多地引导个体作为集体的一分子，作为“组织性的人”而生存，那么今日的我们更多地朝向的是“市场的人”，也就是成熟的被消费者和消费者。“规限的社会用纪律、口令、奖励来实现控制，而控制的社会以欲望、知识、消费利益等来调节控制。在规限的社会，人在社会组织中获得位置，教育就是把人规训为一个组织性的人；控制的社会通过身体的欲望而控制身体，它把人生产为一个消费者，教育就是训练成熟的被消费者和消费者，这就是市场的人。”（金生鉉，2004）<sup>25</sup>两者都构成个体通往公共生活的阈限，导致个体公共精神的衰微。

素质教育命题的提出，可谓当代中国教育实践的自觉性的表达。“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

征的教育。素质教育要使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和学会审美，为培养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奠定基础。”（国家教育委员会，1997）我们的素质教育所倡导的诸种素质，通常包括道德素质、智力素质、身体素质、审美素质、劳动技能素质等，这些素质基本是平行展开的，并没有突出不同素质之于个体发展的不同意义，尤其没有突出素质发展的实践指向，即如何将个体素质的发展融入社会实践之中，让个体素质的发展成为社会公共福祉之所系。

我们今日的整体社会生态，由于公共生活空间不够成熟，个体更多地选择在个人生活世界中精致地打拼，无暇去关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正义与秩序。“小悦悦事件”<sup>①</sup> 可谓我们今天社会公共生活塌陷<sup>②</sup>或者说缺位的典型案例。素质发展如果指向的只是个人私己性生活的精致，那么这样的素质发展不可能给社会带来福祉，最终将导致私己性个人精致生活的破灭。“我们必须认清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我们训练的只是那些期望‘被使用’的专才，他们凭靠自己并不能发现合适的工作，甚至把确使其能力或技艺得到恰当使用的问题视作他人的责任，那么我们就不是在为自由社会培养和教育人。不论一个人在某一特定领域中有多大的

---

① 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在佛山相继被两辆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这一事件引发网友广泛热议。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在0时32分离世。2011年10月23日，广东佛山280名市民聚集在事发地点悼念小悦悦，宣誓“不做冷漠佛山人”。2011年10月29日，没有追悼会和告别仪式，小悦悦遗体在广州市殡仪馆火化，其骨灰将被带回山东老家。这个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人们的公共生活热情与公共价值期待，但问题在于，一旦热点过去，怎样把这种微弱的公共生活热情与公共价值期待变成持续的、深度的公共生活启迪与公共价值启蒙。这无疑构成了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伦理问题。

② 说“塌陷”似乎不够准确，因为除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曾有过一定范围内的充分开启，近百年来，可以说并没有建构出成熟的公共生活形式。